

# 伊里亞斯與情緒社會學研究

劉維公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本文希望藉由伊里亞斯的“文明化理論”之介紹，將為人所忽略的“情緒”概念帶進社會學理論思維之中。伊里亞斯強調，人類社會是由人與人彼此交織相互依賴而形成的，而在交織關係中，情緒連結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伊里亞斯進而指出，現代社會的情緒表達與控制是以自我束縛為特色，尤其是表現在對羞恥的敏感之上。本文將運用“羞恥”概念觀察現代消費社會的權力運作，以顯示伊里亞斯學說的重要性。

## 一 將“情緒”概念帶進社會學理論思維

情緒 (Affekt, emotion) 可以說是伊里亞斯 (Norbert Elias) 在建構其“文明化理論” (Theorie der Zivilisation) 時切入問題進行分析的主要界面。伊里亞斯在《論文明化的過程：社會源起與心理源起之研究》第一冊開頭的導言即清楚指出，他的研究試圖去探討一個為社會學所忽視的問題：在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人類是如何處理情緒的表達？而這些不同的情緒表達方式是否有一個特定的發展趨勢，而此一趨勢可以稱之為“文明化”？<sup>1</sup> 對伊里亞斯而言，文明化雖然不是人類經由“理性”有計劃、目的、精心設計的結果，但其發展卻也不是毫無結構秩序可言。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古到今人類情緒表達的方式，描繪出一個具有特色的文明化發展秩序。



情緒表達的壓抑 (Dämpfung der Affektäußerungen), 以及從以他者束縛 (Fremdzwänge) 的方式轉變成以自我束縛 (Selbstzwänge) 的方式控制情緒, 是伊里亞斯在其研究中所要舉證的人類文明化發展方向。伊里亞斯指出, 社會的不斷功能分化, 使得人與人之間更緊密的交織 (Verflechtung) 在一起, 形成更強烈的依賴關係。然而此頻繁的互動並未引發社會成員彼此之間更多的摩擦或衝突, 這並非是因為透過外在於個人的社會制裁力量之故, 反而是因為個別成員習慣性地如同自動自發地克制自己的情緒, 避免自己情緒的爆發。換句話說, 隨着人際關係結構 (Wandel im Aufbau der menschlichen Beziehungen) 的變遷, 個人的心理習性結構 (Wandel im Aufbau des psychischen Habitus) 也會跟着改變, 而形成具有文明化特色的言行舉止。<sup>2</sup> 必須注意的是, 伊里亞斯認為, 人類在情緒控制 (Affektkontrolle) 方面的行為演變不能簡單化約成是理性化 (Rationalisierung) 的表現, 而是必須將其看做是具有個別作用力且同等重要性的影響因素——用伊里亞斯的語言, 即心理化 (Psychologisierung) 因素。伊里亞斯以“心理化”一詞去突顯在長期的社會演化過程中, 人類在克制其情緒、生理驅力 (Trieb, impulse) 上的發展趨勢, 而在分析上, 不應該將此趨勢等同於人類智識思維的理性化發展趨勢。<sup>3</sup>

伊里亞斯文明化理論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在於, 將情緒起伏狀態 (Affekthaushalt) 或心靈起伏狀態 (Seelenhaushalt) 作為其研究的重心。<sup>4</sup> 本文主張, 當代社會學需要更加強對人類感覺 (Gefühl, feeling) 或情緒方面的研究分析。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二點: 一是關於社會學研究的本身, 另一則是關於現代社會的發展。情緒對社會生活的影響, 是無法否定的。在日常生活中, 每個人對於情緒這類的問題並不陌生, 而每個人也相當在乎這類問題。可是, 翻閱普通社會學的入門書籍, 一般而言是不會



有專門的一個章節介紹情緒的社會學意義。在社會學的研究傳統中，關於情緒的研究習慣上都被歸為社會心理學的領域，雖然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清楚指出，人類的情緒表現不是由個人的生物心理因素所決定，而是受到社會力 (social forces) 如各個社會化執行機構 (家庭、學校等) 的形塑，但其研究偏重於微觀 (micro) 層次的探討，人類的情緒表現與巨觀 (macro) 層次的整體社會發展 (如結構變遷、社會整合等) 之間進一步關係的探討，並未受到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重視 (或者說，原本就不屬於其學術研究的範圍)。<sup>5</sup>

此外，一般社會學針對人類“行動”進行研究，大多數都是集中在行動者關於價值、態度、意義等知識層面的調查分析，而非行動者對其行動的感覺體驗。關於“情緒”的社會學分析一直處於社會學整體論述場域的“邊緣”、“殘餘”位置，如何擴展被壓縮的“情緒”社會學論述空間是一項嚴格的挑戰。

社會學家應該更積極進行關於感覺或情緒這方面的探究，並非只是為了修正過去研究本身的偏頗，同時也是希望透過這方面的研究因而能夠更充分、更適切的掌握到現代社會發展的特色與問題。當代社會學家之所以需要多加注意人類情緒與現代社會二者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因為現代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一項相當突出的活動領域——消費娛樂 (entertainment)。現代消費者追求樂趣，娛樂不再只是特定消費產品的內容，而是逐漸成為所有消費必須具備的要素。針對當代的經濟發展，專家學者觀察到娛樂業成為新世界經濟的推動力量，將其稱為娛樂經濟 (the entertainment economy) 的到來。<sup>6</sup> 消費社會學注意到了情緒的“商品化”問題以及娛樂產業成長的速度或比率，但主要關心的則是“大量的消費產品直接訴求於情緒 (如樂趣等)”所意涵的社會學意義，尤其是關於當今社會與個人二者



之間關係的問題討論。這一問題的挑戰是來自於兩方面。一方面是消費社會本身所宣揚的一種意識形態，即享樂主義(hedonism)。它主張，現代人應該掙脫社會的枷鎖桎梏，盡情地追求生活的享受。透過消費，社會對個人心理情緒的束縛(Zwang, constraint)或控制被加以顛覆。享樂主義的消費文化具體表現在個性化商品市場的成長之上。

另一方面則是法蘭克福批判社會理論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概念觀點。消費文化並非真的解放了社會對人類情緒的束縛，反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更細微的社會控制手段。消費者的需求事實上是被以人為操縱的方式創造出來的，現代人滿足於這些虛假的需求，而無法認清自己的被宰制地位。<sup>7</sup>

現今人類往往是在消費文化的脈絡之內處理自己的情緒，以消費表達自己的性情、情緒。然而，上述兩種觀點之間的爭議突顯出來，在現代消費，個人心理情緒與社會權力控制二者間的關係非常的複雜，需要研究者建構更完整的“情緒”理論，以利分析的進行。

因此，本文的目的並非要以歷史考古資料去呈現在人類文明化過程中各階段消費文化的演變，或是論證當代消費文化的享樂主義發展特色對伊里亞斯的文明化理論的挑戰。這些研究必須先奠基在一個基礎之上，那就是在理論層次先釐清情緒概念的社會學意涵。在這方面，伊里亞斯留下不少深具啓蒙的想法值得介紹，論者往往注意到其文明化理論的見解，卻忽略了伊里亞斯關於情緒社會學研究的貢獻。





## 二 伊里亞斯的情緒社會學研究之介紹

處於世紀接替的時期，人類對自身發展演變的不確定感往往變得更為強烈，為文明的前景感到更為憂心，進而希望為問題提出根本的解決之道。“遠離野蠻”，原本是現代文明社會對自己本身的認定，也是人類對自己相當自豪的成就。然而，面對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尤其是集體的、制度的、異於常態的、超乎想像的暴力——不論是以戰爭或是犯罪事件的形式——出現在現今人類生活的世界裏，暴力的威脅似乎變成無所不在，反倒是“重新回到暴力”往往成為現代社會病理學家經常下的診斷結論。<sup>8</sup> 檢視暴力與現代社會二者之間的關係，成為非常迫切的研究工作。《現代性與野蠻：二十世紀末之社會學時代診斷》論文集的目的即是試圖對此問題提出充分的釐清。<sup>9</sup> 在該書中，伊里亞斯的論點常被拿出來討論。該書的編者米勒 (Max Miller) 與叟福樂 (Hans-Georg Soeffner) 在導言中指出，對伊里亞斯而言，現代文明化的主要成就是，在行為的基本層面而非社會功能系統層面上能夠將個人的心理情緒起伏狀態加以“馴服化” (Domestizierung)。隨着現代文明社會的發展，人類將能逐漸擺脫攻擊的生物本能驅力，而與他人和平相處。<sup>10</sup>

可以看到的是，“暴力之減少”或是“暴力之壓制”的人類社會演變方向，是一般論者對伊里亞斯文明化理論的了解，因而也是其批判者提出質疑的主要着力點。例如批判伊里亞斯文明化理論最多的學者杜爾 (Hans Peter Duerr) 根據文化歷史及民族學的資料主張：事實上，同現代社會相比，傳統社會裏社會成員在人際關係上有着更緊密的交織依賴，而且有更嚴密的社會控制手段，尤其是透過非正式的形式，束縛個人的情緒與行動。<sup>11</sup> 杜爾認為伊里亞斯的論點是典型的“文明化過程神



話”(der Mythos vom Zivilisationsprozess), 其所描繪的“情緒或生物驅力的壓抑”文明化發展過程其實並不存在, 藉由其理論區分西方的文明社會與非西方的不文明社會, 剛好為帝國殖民主義侵略找到合理的藉口。

伊里亞斯文明化理論所引發的討論與爭議, 並不只在論證下列的問題: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何者存在較多或較少的暴力?<sup>12</sup> 如同上一節已經說明的, 本文的主要意旨並不是在為伊里亞斯文明化理論辯護或是對其加以批判, 而是希望積極吸收伊里亞斯的“情緒”社會學研究。而且, 即使他對人類文明化發展趨勢的分析出了問題, 這也不意味着他關於情緒控制方面的探討是錯誤的, 相反地可能是更珍貴的想法。

介紹伊里亞斯關於情緒概念的論述, 必須先從其關於社會與個人二者關係的基本社會學立場談起, 如此才能清楚了解情緒概念對伊里亞斯學說的重要性。伊里亞斯認為, 一般研究者在思考個人與社會二者的關係時, 經常把個人或是社會當作獨立存在的“客體”(Objekte), 以致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被想像成獨立的物體共同陳列的狀態, 彼此“由一無法跨接的鴻溝所分隔”。<sup>13</sup> 伊里亞斯在其論文集《個人之社會》指出, 一般“個人”與“社會”概念所遇到的問題分別是:

前者概念指的是個別的人類, 而他好像是一個完全為自己獨立生存的存在物, 後者概念則是在兩個彼此對立但同樣錯誤的想法中遊走。這裏所謂的社會若不是被理解成一單純的總和體, 由許多個別的人類所總加而成, 因而彼此是毫無結構的鄰接並存, 不然就是被理解成一客體, 而它是以超乎個別人類之外以無法再解釋的方式生存着。<sup>14</sup>





可以明顯看到，對伊里亞斯而言，缺乏連結 (Bindung) 關係，是這些概念想法最大的問題。根據伊里亞斯的觀點，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並非並列的關係，而是人與人彼此“交織”，形成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z)，在無須區分主體與客體的情況下共同建立社會。伊里亞斯特別以“接合” (Figuration) 概念來指稱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相互依賴交織狀態 (miteinander Interdependenzgeflecht)。<sup>15</sup> 在社會世界，每個人的存在必然與其他人有所接合，並透過他人再與另外的他人接合，形成更長遠複雜的行動鏈。伊里亞斯的社會圖像是充滿交織關係的網狀形態。因此，這裏必須提醒的是，要想充分理解伊里亞斯的“接合”說法，必須掌握到他試圖藉由該概念突顯人際互動中的交織狀態與過程。

由於強調人際關係的交織互動狀態，也就不難了解為甚麼人類的情緒是伊里亞斯的研究焦點所在。因為伊里亞斯認為，人類的情緒是促使個別的人在接合的過程中相互連結的重要因素。促成人與人彼此連結以及相互依賴的原因，並非完全依靠分工 (即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的主張) 或是社會規範 (即派深思 [Talcott Parsons] 的主張) 等不涉及個人情感的因素。伊里亞斯主張，

論者將無法充分掌握社會性的相互依賴問題，一旦論者只着重在相對的非私人情感性的 (unpersönlich) 相互依賴之上。只有當論者將私人情感性的 (persönlich) 相互依賴，尤其是人與人間的情緒連結當作是社會的連結媒介，將此想法帶進社會學理論領域之中時，論者才有可能獲得完整的了解。<sup>16</sup>



此處必須加以說明的是伊里亞斯的情緒概念。對伊里亞斯而言，情緒是生物性的，但其表現及控制則是社會性的。一方面，情緒是來自人類的生物構造，因而會對人類行動造成無法否定的影響。<sup>17</sup> 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超越生物決定論的觀點——從其文明化研究則可以了解到，也就是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人際關係結構的變遷與個人心理習性結構的變遷緊密關聯。伊里亞斯特別指出，在文明化過程中，有兩項主要因素造成人際互動關係的變遷，而其連帶地改變了個人心理機制的形塑，這兩項因素分別為：一是社會功能的不斷分化(*die fortschreitende Differenzier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Funktionen*)，另一則是身體暴力的絕對控制(*die Monoplosierung der körperlichen Gewalt*)。對伊里亞斯來說，功能分化的意義並不是在於系統的自我再製 (*Autopoiesis*)，而是在於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行動鏈 (*Aktionsketten*) 更加擴大與複雜。此一分化複雜的行動鏈要求每個行動者具備嚴格的自我管制 (*Selbstregulierung*) 能力，否則將無法維持彼此之間愈加緊密的相互依賴。<sup>18</sup> 根據伊里亞斯的理論，對於現代文明人自我束縛或自我控制 (*Selbstkontrolle*) 的發展而言，身體暴力的絕對控制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sup>19</sup> 透過絕對控制的機構穩定地監控暴力，將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在正常的情況下不再受到來自他人突如其來的暴力威脅，而與此同時也要求每個人對自己的行動與情緒加以克制。身體暴力的絕對控制創造一個安全與穩定的生存環境，而這些特質將會在個人的心理習性上產生沉澱效用，不再習慣於依情緒與本能驅力行事，而是自我克制遵循律法規章。

伊里亞斯在其《論文明化過程》研究著作所發展出來的核心理論命題即是，“社會功能的不斷分化”以及“身體暴力的絕對控制”這兩項人類社會演化因素形塑出以自我束縛取代他





者束縛為特色的現代人心理機制。簡單來說，伊里亞斯將社會束縛或控制區分成他者束縛與自我束縛。在他者束縛中，是由他人負責執行社會束縛的工作，而在相對的自我束縛中，個人自己本身則是社會束縛的執行單位。然而更重要的是，自我束縛是個人在自己的心理習性層次上所養成的自己控制自己的行動與情緒。自己控制自己是從小到大生活經驗的累積沉澱，成爲一種自動發揮作用的習慣 (automatisch funktionierende Gewohnheit)。自我束縛是自動自發無須他人督促與介入的社會控制形式，是在“自我”內部分化成“主我”(Ich)與“超我”(Über-Ich)，由後者監控心理的起伏狀態。因此，伊里亞斯指出，自我束縛是相當經濟的社會控制手段。<sup>20</sup>

“羞恥”(Scham, shame)是現代人自我束縛的典型運作方式。伊里亞斯認爲，現代人對尷尬 (Peinlichkeit, awkwardness) 或羞恥相當敏感且積極避免，正是人類社會朝自我束縛文明化發展方向的主要行爲表現。要想知道伊里亞斯爲何以羞恥作爲文明化過程實際觀察的焦點，有必要先知道何謂“羞恥”。

“做錯事”(wrongdoing)的感受並不一定會讓人感到羞恥，它往往會讓人覺得“罪惡”(guilty)；一旦人們有“個我的缺陷”(personal insufficiency)的感受時，個人才會爲自己感到羞愧與可恥。罪惡感主要是道德良心的問題；而羞恥感主要是自我尊嚴的問題。<sup>21</sup>換言之，羞恥的起因是由於自己的行爲破壞或違背了自我圖像 (Selbstbild)，亦即對自己本身所建立的圖像。羞恥是自己傷害了自我圖像所引發的焦慮情緒，而此一情緒會進一步造成存在安全感 (existentielle Sicherheit) 的喪失。<sup>22</sup>

由於與自我圖像密切相關，因此羞恥能對個人的行動產生控制的作用。因爲個人會在言行舉止上避免傷害對自己而言相當重要且具有神聖性質的自我圖像。伊里亞斯的羞恥社會學分析即是從此一層面切入。他指出，有一部分的自我其實屬於



“超我”，是“社會意見”在自我內部的代言。<sup>23</sup> 一旦社會控制的執行單位“進駐”到自我內部，順從束縛抑或反抗束縛二者間的衝突不再是發生在自我外部，反而是形成自我內部的衝突。羞恥一方面製造內部的緊張，“過去直接發生在人與人之間抗爭的緊張，如今皆被轉換成個人與自己本身抗爭的內在緊張”。<sup>24</sup> 另一方面製造內部的焦慮，人與人面對面之間的焦慮逐漸減少，增加的是由超我所引發的內在焦慮。<sup>25</sup> 現代社會是以羞恥為主要的社會束縛形式，其作用力並不比“懲罰身體”這類形式的社會束縛來得差，甚至是更為強制（因為其正當性是來自內化的自我圖像）或是更為經濟（因為其執行無須他者的具體介入）。

### 三 美感 (Erlebnis) 消費社會的社會束縛——羞恥

本文以有系統的方式介紹伊里亞斯的情緒社會學研究。伊里亞斯強調，人類社會是由人與人彼此交織相互依賴而形成的，而在交織關係中，情緒連結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伊里亞斯進而指出，現代社會的情緒表達與控制是以自我束縛為特色——尤其是表現在對羞恥的敏感之上。接下來，本文將以如何運用“羞恥”概念觀察現代消費社會的權力運作，以顯示伊里亞斯學說的重要性作為結語。

消費社會學與一般消費研究如行銷研究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主要焦點是針對消費文化在社會權力的結構關係與運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斷進行分析。從早期的法蘭克福批判社會理論到現今主流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及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秀異 (distinction) 理論，消費文化與社會權力二者的關係皆是其核心的探究議題。然而，這方面的討論已逐漸拋棄



將“消費文化”等同於“社會控制”此一化約式的且非常負面的思維架構，而能更適切地去掌握消費文化與社會權力之間可能存在的辯證關係。當代消費社會學研究提出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美學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概念。該概念主張，消費者的行動自主性，消費文化不是完全壓抑、控制被宰制者的工具，而是每個人日常生活美學所自主建構出來的美的體驗。<sup>26</sup>

德國社會學家叔策(Gerhard Schulze)進一步指出，美感已經是現代人主要的存在形式(Existenzform)。在現代社會，“以美的生命作為志業”(das Projekt des schönen Lebens)已經成為一個大眾現象。於是，叔策在其著名暢銷(於德語世界)學術作品中，正是以“美感社會”(Die Erlebnisgesellschaft)為標題，並以此稱現代社會：現代人在思考與行動上是以美感為取向(erlebnis-orientiert)，依據其(日常)生活美學(Alltagsästhetik)，積極建立自己以美感為主的生活環境。<sup>27</sup>

根據叔策的理論觀點，必須釐清的是，“美”並不是由外在世界降臨到行動主體身上，反而是行動主體主動在外在事物上創造出來的；美感不是存在於外部的世界，然後再被主體感應到，而是在主體自身內部的過程中經由主體自己製造出來的。<sup>28</sup>叔策強調，美感取向是內在取向的。他區分外在取向與內在取向的生活觀，其間的差異在於生活到底是由何者因素所主導：週遭情境抑或主體自己。前者是由情境所決定，而後者則是由主體所掌控。美感社會的形成正是意味着，現代人的生活觀逐漸從外在取向轉變成內在取向。<sup>29</sup>在現代社會，主體之所以擁有較大的自主力量是因為物質生活水準的提升、教育程度的提高、科技的進步等因素的支撐。現代人已不再生活在匱乏而是相對富裕的社會世界。<sup>30</sup>



此處無法完整介紹叔策引起德國社會學界熱烈討論的龐雜消費文化理論。提出叔策的研究，是希望藉此突顯出當代消費文化正在演變的進一步分化：現代人的生活美學及其生活風格逐漸是以美感為特色，而不再完全只是布爾迪厄所謂的秀異。<sup>31</sup> 不論是布爾迪厄或是叔策的理論，其所探討的生活美學都不是先驗的，而是在社會歷史發展脈絡中生成的。行動者是在社會生活中養成其特定的生活美學。簡單來說，美感與秀異是兩套不同的生活美學，前者重視的是內在個人的心理情緒，而後者在乎的則是外在社會的身分地位。由於當今的消費文化研究深受布爾迪厄學說的影響，“秀異”幾乎被當作是消費的代名詞，而忽略了不少消費追求的其實是單純的美感。

然而，追求純粹美感並不意味着其過程中不存在任何社會的束縛。追求美感的生活美學可以說是行動者個人的自我圖像。從上一節的討論可以了解到，內在美感取向的消費者同樣會受到制約，只是主要的束縛是來自於個人自己，形成個人與自己本身之間內在的緊張與焦慮。對美感取向的人來說，消費生活風格是否合乎社會集體的價值規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是否合乎個人所堅持的自我圖像。個人在表現其生活風格時，並不擔心其失去秀異的正當性，而是害怕自己的消費行為會傷害到自己的自我圖像，使自己感到羞恥或遭他人羞辱。因此，在以秀異為特色的消費文化領域中，社會權力的運作是他者束縛的形態。相對地，在以美感為特色的消費文化領域中，社會權力的運作是自我束縛的形態。

了解到日常生活美學的分化發展，讓研究者能夠充分掌握到現今消費文化領域中也同時分化發展的社會束縛。然而，這樣的分析只有在研究者打開視域，將情緒概念帶進理論思維架構之中才有可能。社會權力的展現並不只是沿着規範性的層面，而且還有情緒性的層面。這一部分不應該受到忽視。





## 注釋

- 1 參考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 VII–VIII.
- 2 參考 Norbert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I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6), 315.
- 3 同上注, 369–397.
- 4 根據Langenscheid德文辭典的解釋, Haushalt一詞放在字尾時(-haushalt)指的是身體內部的物質或能源交換過程。因此, 此處將其翻譯成“起伏狀態”, 以表現出情緒或心靈在面對不同情境或互動時所可能形成的不同狀態。
- 5 參考 Steven L. Cordon, “The Sociology of Sentiments and Emo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ed. Morris Rosenberg and Ralph H. Turn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562–592.
- 6 參考Michael J. Wolf, 《無所不在: 娛樂經濟大未來》(*The Entertainment Economy*), 汪睿祥譯 (台北: 中國生產力中心, 2000)。
- 7 參考 Herbert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1994)。
- 8 參考劉維公, 〈暴力的曖昧性: “暴力在現代社會” 之文化社會學觀〉, 《當代》第一百五十二期(2000), 76–85。
- 9 參考 Max Miller 與 Hans-Georg Soeffner 合編的論文集 *Modernität und Barbarei: Soziologische Zeitdiagnose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6)。這本論文集是一九九四年由德國社會學會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及漢堡德國社會研究院 (das 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所主辦的研討會成果。研討會當時曾引起相當大的迴響, 與會發表論文的知名學者包括: Zygmunt Bauman, Shmuel N. Eisenstadt, Ralf Dahrendorf, Niklas Luhmann, Claus Offe, Ulrich Beck, M. Rainer Lepsius 等人。諷刺的是, 漢堡社會研究院主持人瑞茲曼 (Jan Philipp Reemtsma) 在一九九六年遭到綁架, 交付贖金三千萬馬克後被釋放, 震驚當時德國社會。
- 10 Max Miller and Hans-Georg Soeffner, “Modernität und Barbarei: Eine Einleitung,” 收於同上書, 15。



- 11 Hans Peter Duerr, *Nacktheit und Scham: Der Mythos vom Zivilisationsprozes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10.
- 12 關於伊里亞斯文明化理論的相關批評，請參考顧忠華，〈人類的文明與命運：伊里亞斯的學術關懷〉，《當代》第八十九期(1993)，16–31。
- 13 Norbert Elias, *Was ist Soziologie?* (Weinheim und München: Juventa, 6. Aufl. 1991), 9.
- 14 參考 Norbert Elias, *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7)。該論文集收集了他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八七年不同時期所寫的針對“社會與個人二者的關係”的三篇長篇文章，足見伊里亞斯對此一議題的長期關注。
- 15 Elias, *Was ist Soziologie?* 12, 139–145.
- 16 同上注，149。
- 17 同上注，147。
- 18 參考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II*, 319。
- 19 同上注，320–321。
- 20 同上注，328–329。
- 21 參考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65。
- 22 參考 Sighard Neckel, “Achtungsverlust und Scham: Die soziale Gestalt eines existentiellen Gefühls,” in *Zur Philosophie der Gefühle*, ed. Hinrich Fink-Eitel and Georg Lohman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46。
- 23 參考 Elias, *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II*, 398。
- 24 同上注，406。
- 25 同上注，407。
- 26 參考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1991)。
- 27 參考 Gerhard Schulze, *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Campus, 1993)。德文 Erleben 指的是對生命、對事物的體驗。依據叔策的理論，現代人生命的體驗即是美的感受，不斷強調“以美的生命作為志業”。因此此處將德文原文翻譯成“美感”應是貼切的作法。
- 28 同上注，44。
- 29 同上注，37。
- 30 同上注，55。
- 31 參考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